

# 行云流水一孤僧

## ——作为留德学人的朱偁及其德国学养

叶隽

文艺兴趣,乃是青少年人往往难免的爱好,但朱偁的这段陈述显然饶有意味,爱之却绝不以之为专业,因为他认为艺术是要靠天资的,随心所欲即可也,这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见地。



作为一代学人,朱偁先生是不应该被学术史遗忘的。作为南京古迹保护者的朱偁,早已为世人所知悉,但我在此想谈论的,是作为留德学人的朱偁。

朱偁是朱希祖之子,曾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朱希祖,自然是学养深厚,但朱偁却又有所不同,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,在承袭了家世固有的国学修养之外,又西向求学,负笈德意志。更有意思的是,朱偁的本色当行,竟然是经济学,具体来说是财政,他自己曾谈及为何选择此一专业:

余在国内大学,所习本为政治,既入柏林大学,以德国政治经济,并称国家科学(Staatswissenschaften),而经济财政,尤以德国最为发达;社会主义之经济学说,以全体人民为依归之福利政策,以及伦理观点之财政学说,皆以德国为其发源地。故决定改学经济,专治财政。于时柏林大学,讲财政学者 Herkner 及 Bernhard,讲经济学及经济史者有 Sombart,讲气象学者有 Wagemann,讲统计学者有 Borkiewicz,并一时名师,余皆选习其课,而尤私淑 Herkner 及 Sombart 二师。以其治学方法谨严,搜罗宏博,有德国历史学派遗风,实与余之个性相近焉。(朱偁《留学欧洲生活之回忆》,载《新中国月刊》1945年第3期第43页)

如此可以见出,朱偁之选修经济,所师从者尽皆德国学术大家,包括桑巴特、海克纳、瓦格曼等人都是一时之选,这也就难怪他底蕴深厚,在归国之后毅然自立,主掌中央大学经济系,成为经济学的翘楚人物。然而,如果以为朱偁只是满足于专业内的孜孜求学那就错了,那代人的眼光和兴趣都甚为广博,具有大理理想的学术抱负。

譬如朱偁就谈及对于大学的认知:

虽然,大学之所以称 University(直译包罗万象),以其研究所及,无所不包;况柏林大学继 Fichte 及 Hegel 学风,沉思冥搜,好谈哲理,而当时主讲哲学家,如 Spranger 及 Dessoir,又皆一时之选。故余亦间习哲学,选听各课。此外当时历史讲座,亦多名宿,则更从 Onken 习近代史,从 Hartung 习中古史,俾对于欧洲近代文化之源流,得深入之认识也。

显然,作为世界学术场域中心的德国大学给了朱偁以非常深刻的印象,而无论是学术史上的费希特、黑格尔等大哲,还是现实中的斯普朗格、德索等大家,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,能沐浴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和语境之中,这不得不说是那代留德学人的大幸运。当然,对于学人个体的发展来说,生性(habitus)本身无疑也很重要,按照朱偁的说法:

惟余之个性,本近文艺,对于西洋文学,宿具爱好,所以未改学文学者,因一向认为艺术方面,以天才为第一、非强学所可几及。德国大诗人中,如史勒(Schiller)本习医学,海涅(Heine)本习法律;而盖世知名之诗圣歌德,又何尝专治文学?故不计及此,惟于课余之暇,从事文学素养;兼以时出游,领略西欧艺术。这种文艺兴趣,乃是青少年人往往难免的爱好,但朱偁的这段陈述显然饶有意味,爱之却绝不以之为专业,因为他认为艺术是要靠天资的,随心所欲即可也,这未尝不是一种高明的见地,他所列举的德国文学史上的伟人巨子如歌德、席勒、海涅等皆转行而来,放之中国亦然,鲁迅、郭沫若不都是学医的?不过话说回来,也正是这种广博的知识兴趣,反之又大大促进了他的文学艺术细胞。而让人尤其感到羡慕的,是朱偁的德语文学修养,居然也是那么的出类拔萃,因为他自己爱好本来就是文艺,尤其对德国文学倾心。

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,朱偁显然对德国文学情有独钟,是一个不亚于专业水准的“超级发烧友”,其北大同学曾追忆过他对德国语言和文学的热爱:

受他父亲影响,伯商中学时代(按: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)就迷上德文诗歌,海涅的 loreley 曾让他感叹不已,从此对这个国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枯燥艰深的德语在他看来格外优美。后来他在德国遇到他的情缘,冥冥之中似乎自有安排,这是后话。在德语作家里他尤其喜爱施托姆,那时施托姆的翻译小说也很流行。那有着诗一般清瘦舒缓的故事,诉说着惘然若失的淡淡悲伤与失落,在我们年轻的心坎上击打出共鸣,也许与大家的情爱有太多的相似吧。(转引自励俊《风流总被雨打

风吹尽——追忆朱偁先生》)

这里有几点值得提及,一是家世影响。朱希祖是留日背景,自然不乏在日本接受德国学术文化的影响;其次可能是通过蔡元培的间接影响,蔡元培曾师从德国文化史家兰普莱西特,且他在北大改革就借鉴了德国洪堡大学的理念。二是其时北京的中学德文教育值得关注,像北京四中对冯至、朱偁这一批学生提供了基本的德语和德系知识的入门教育。三是朱偁与施托姆的因缘,这种和某个专门的德语作家结缘的现象是翻译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,确实朱偁不仅翻译了《茵梦湖》,而且还翻译了施托姆的诗集《燕语》,据他的同学回忆:

至今留在我手边,有一册施托姆《漪溟湖》,开明二岛店的漂亮小开本,这应该是伯商最早的书。原书当时已有郭沫若的译本,伯商很喜欢,说它“文句颇流利,意味也深长,可说是译品中不可多得的文章”。但郭译是杂志上的急就章,字句不免错漏,让伯商不大满足,干脆就趁这个时机自己动手来译。伯商曾开玩笑说翻译好象感情,容不得半点纰漏,让我印象很深。这其实是他的秉性,做事认真一丝不苟。我不懂德语,对翻译自然没有发言权,只好笑话他:“哪有谁恋爱会斟字酌句这么叫真儿。”后来他还选译了施托姆的诗,同样由开明出了一本小书《燕语》。(同上)

可见在中国德语文学翻译史上,朱偁自有其地位,就施托姆汉译而言,他可以说是颇有贡献的,为《燕语》作颇长的序言,称施托姆为“德国短篇小说之始祖,十九世纪欧洲文坛之巨擘”,说“施氏一生不作长篇小说(Roman),不作戏剧(Drama),氏只作诗(Gedicht)与短篇小说(Novelle)。氏称短篇小说为‘散文诗最绵密的形式’(die strengste Form der Prosadichtung);为‘戏剧之姊妹’(die Schwester des Dramas);他要求‘最严谨的结构,排除一切不需要的成分’(die geschlossenste Form und die Ausscheidung alles Unwesentlichen)”。这段叙述,以及德语原文的明确标出,可以看出朱偁的严谨和认真。所以他敢于挑战郭沫若,直接逐条指出郭沫若不足并批评之。对这一点,茅盾曾说过:“郭译《茵梦湖》也有错误,朱偁的《漪溟湖》(这是原

书的第三种从德文译出的译本)逐条指出错译十多处。可惜创造社诸公丈八灯台只照见了别人。”在这里,朱偁的译文被茅盾用来作为批评郭沫若的利器,确实可见其德文修养之不凡也。

总结下来,朱偁至少在五个方面都有所贡献,有些方面甚为杰出,其一是教育史上的师长风范,他在本专业的出色当行是经济财政,曾出任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,对培养学生、组织师资、构建专业,都做出了很骄人的成绩;其二是文学史上的别出眼目,在散文、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各个门类内都有所尝试,有所成就。小说有《泡影》《怅望》《流到人间去的红叶》等,还有戏剧作品《郑成功》;其三是翻译史上的有所贡献,虽然只小试牛刀地在青年时代翻译了施托姆的两部著作,但已经是让人刮目相看;其四是学术史上的发凡起例,在那个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还基本处于创立不久,一切都待开天辟地的时候,他对南京、北平的城市研究确实有发凡起例之功,《金陵古迹图考》《金陵古迹名胜图考》《建康六朝陵墓图考》《北京的宫阙图说》等留存了大量一手资料,而《杜少陵评传》更具有以德国范式开山的作用;其五是政治史上的勇于入局,他敢于任事,在抗战时代曾出任过民国政府的官员(曾参与越南受降),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曾担任过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等职务,虽非高官,但也体现出一个人的责任担当,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能崭露头角都已非常不易,更何况在诸多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浓重印迹。

朱偁最了不起的,是其横溢而出的天赋才华,提笔即成文章,而且兴趣广泛,无所不涉,都能成一家之言。他是中国现代学者里最早撰作学术性的杜甫传的,《杜少陵评传》至今看去,仍有相当的学术价值。他表彰杜甫:

少陵先生,我国之民族诗人也。所谓民族诗人者,其诗歌足以表现民族共同之理想,共同之愿望,共同之想像,共同之情感,共同之生活。杜诗之大,无所不包。上自忠君爱国,忧伤黎元;下至悲欢离合,餓送投赠,从国家大事以至个人日常生活,皆可反映我国民族之思想及

动作。数千年诗人中,求其能代表民族者,盖无出其右。惟我国对于民族诗人,向少表彰。考世界文化民族,每多以其最伟大之诗人,为民族精神之所寄托,如德国之于哥德(Goethe),意国之于但丁(Dante),英国之于莎士比亚(Shakespeare),皆其显例。每逢其民族诗人之百年祭或二百年祭,往往典礼隆重,举国欢腾。作者尝于1932年3月22日,在柏林参加哥德之百年祭,朝野兴奋,上下若狂。即后起之民族,亦莫不培养其民族诗人,如苏俄之于高尔基(Gorki),美国之于路易(Sinclair Lewis),提倡宣扬,不遗余力。而此辈民族诗人,传记评论,往往不下数十种。反观我国之民族诗人,政府不加宣扬,学者不加表彰,寥寥荒凉,一至于斯!为尊崇我国民族诗人计,尤不可不有所表示。(《杜少陵评传·自序》)

应该说,朱偁站在比较文学史的立场上,以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体为框架,重评杜甫的文化史意义,确实是很见其立意之高的。这种对于民族诗人的推崇,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重构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尝试,文学史的研究其意义绝不仅在于梳理史实、理解文本,更有其标定青史、为后来者示范的重要功用。作者回忆留德时代参加歌德百年祭日的情景,很能反映出伟大诗人在民族精神史上的重要意义,而他对杜甫的表彰,其意义更在于能标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,为中国文化发展寻路,为中华民族精神立轨辙。对于这部《杜少陵评传》的精神史价值,我们显然是大大低估了,远远不能体会先贤确立标本时的苦心孤诣。或许,这正是朱偁精神孤独之处,他的眼光和见地都太超前于那个时代,诚如一生飘零坎坷的尼采所言:“我的时代尚未到来,有的人死后方生。”又或许是席勒在《唐·卡洛斯》里塑造的波沙侯爵,他说:“对于这个世纪来说,我的理想过于早熟。我只能做,未来时代的公民臣属。”(Das Jahrhundert / Ist meinem Ideal nicht reif. Ich lebe / Ein Bürger derer, welche kommen werden.)然而,中国确实需要这样的民族诗人,这样一种对于伟大诗人的文学史和精神史标立,